



萧乾评传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萧乾评传

王嘉良 周健男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萧乾评传

王嘉良 周健男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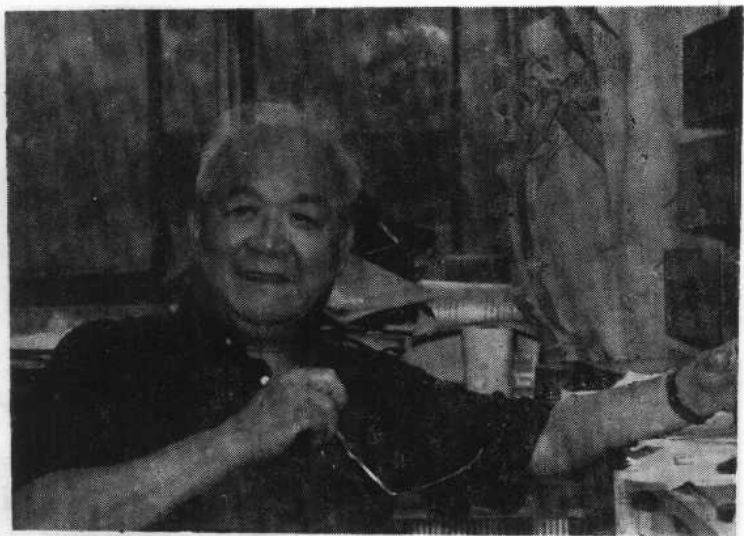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57千字

1990年6月第一版 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336-9/I·48 定价: 5.10元

印数 1—1750册



1976 年摄于书房



1987 年夏摄于北京



少年时的萧乾
(摄于1925年)

一九三四年摄于燕京大学宿舍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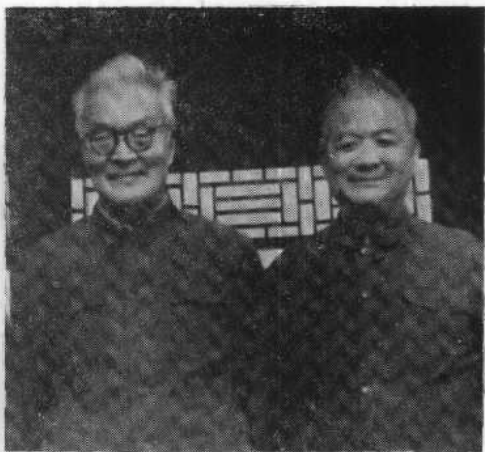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在燕京大学毕业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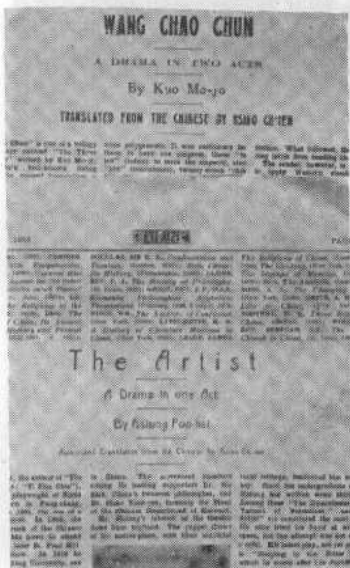




一九四〇年倫敦大轰炸时，
萧乾
为重庆《大公报》撰写的通讯



1974 年与友人孙用在宅前合影



为郭沫若剧本《王昭君》
所译英文本刊于1932年《辅
仁学报》上



1986 年在纽约大学演讲



1986 年与夫人文洁若摄于
威尔士·波特美朗



1989 年在第二届全国书
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展台前



1981 年手术后的萧乾

目 录

第一章 艰难时世(1910—1931)	1
1. “矮檐”下的童年	1
2. 困苦的求学生活	9
3. 走自己的路	17
4. 迷上了文学	25
第二章 创作起步(1931—1935)	34
5. 在摸索中前进	34
6. 脱颖而出的独特“京派”作家	45
7. 反教小说的独异价值	67
8. 早期创作的基本色调	87
第三章 报人生涯(1935—1939)	101
9. 以《大公报·文艺》为阵地	101
10. 找到了艺术的结合点	122
11. 前期散文和特写	139
12. 长篇小说《梦之谷》	154
第四章 海外行踪(1939—1946)	166
13. 赴欧途中	166

14. 披上了黑色道袍	174
15. 西欧战场上的中国记者	185
16. 旅欧通讯和美国散记	194
17. 法西斯末日记——《南德的暮秋》	210
第五章 归国三年(1946—1949)	219
18. 重理旧业	219
19. “书生论政”	228
20. 从迷茫到惊醒	239
第六章 新的旅程(1949 年至今)	246
21. 热情拥抱新中国	246
22. 特写创作的新收获	256
23. 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	267
24. 冬眠的种子冲土而出	279
第七章 萧乾年谱简编	294
附录:	
萧乾与象征主义	丁亚平 344
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日)丸山昇作 361
	李 黎译
后记	389

第一章 艰难时世

(1910—1931)

早年的事，犹如一碗酸辣苦甜咸的菜汤，有一种难以代替的风味。有时它像是远方吹来的一支儿歌，温存而又委婉，恰似春日垂杨柳梢在脸上拂过；有时又像是一场噩梦，仿佛看到自己孑然一身踏过一道独木桥，四面虎狼都在睁大了眼睛，张开血口，等待吞噬。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①

1. “矮檐”下的童年

北京，古老的东方名城。它曾是元、明、清三朝帝王的都城，向来以豪华的殿堂、雄奇的建筑闻名于世。然而，一壁是富丽堂皇，一壁是穷街陋巷；一壁是达官贵人、“王爷”、“贝子”，一壁是一贫如洗饔飧不继的穷户贫民，正构成旧中国都

^① 收《一本褪色的相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市畸形的鲜明特点。在北京高大宫墙的背后，就拥挤着数以千计、犬牙交错的低矮胡同，居住着成千累万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赤贫人家。现代作家、翻译家、著名记者萧乾就出生在北京市东北城东直门附近的一个角落——羊管胡同。

羊管胡同一如北京贫民区的所有浅街陋巷，是地道的“下等人”的处所，一个破破烂烂的角落。窄小的胡同，拥挤不堪的房舍，“晴天是香炉，雨天是锅粥”，沉闷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巷内居住的是一色的赤贫户，所有的是“罗锅子”老人、饥饿的贫妇、蓬头赤足的孩子……萧乾在早年的散文中曾这样描述过他所熟稔的这条窄巷：

……幼年住过的一条窄巷，窄得连星光也无法照临。

两边墙壁传出粗大的鼾声，杂着婴儿尖细的哭声。远地有夜行人打着呼哨，边走还边唱着流水板。一阵咳嗽声有如砍伐枯木（树心已为野禽啄光！）的回响，空洞而响得怕人。^①

他家的住房，在整条巷内尚属中等，只漏不塌。只要下雨，家里和面的瓦盆，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就全得请出来。先是滴滴嗒嗒地漏，下大了就哗哗地往下流。比他家更倒楣的还有的是，每回下雨，都得塌几间、死几口子。因此，他虽说出生在这座名声赫赫的都城，但窳败不堪的处所，自幼与“下人”为伍，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体面”。

萧乾的诞辰是1910年1月27日。从世俗的眼光看，这个“生辰八字”也许并不算坏。因为照旧历推算起来，他的生辰

① 萧乾：《由午夜到黎明》，收《小树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是己酉年腊月，属新年旧岁之交。而从旧历说，还算是宣统元年，同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登上宝座是同一个年头。正是在满城的庆典喧腾不已，锣鼓、鞭炮声犹在耳之际，他呱呱坠地来到人间。但萧乾却并不喜欢自己的生辰，反而认为这是个“倒运”的日子。这年头，清王朝愈益腐败，洋鬼子的气势更加咄咄逼人，把国家推到了苦难的顶端；人民群众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仅1910年这一年，就剧增到二百八十多次，清王朝陷入摇摇欲坠的危局。是这样一个腐败的政府，把他和成千上万的居民推入无以为生的贫民窟里，他的诞辰与宣统登基同年有什么可以值得荣耀的？更何况，这个宣统以后还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做起侵略者的傀儡，他始终感到出生在这年月是一种奇耻大辱。所以他在过去填写出生年月时，总要把自己的生年往后推一年，改写成1911年，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那一年。这个说法一直相沿很久，写在他的干部登记表上，记载在文学家辞典里，印在他写的书的作者介绍栏里，甚至还流传到海外，直到近年来道破了奥秘，才把这一点改过来。

在那个社会里，萧乾生来就有“矮人一头”的感觉。他原名萧秉乾，由于个子生得矮小，人们取谐音，把他唤作“小饼干”。1979年他出访美国，碰到了中学时代的老友，相见之下，对方已记不得他的大名了，只叫得出他的雅号“小饼干”。然而，这不过是友朋之间的玩笑取乐；使萧乾真正蒙受耻辱的，并不在生就一副尺寸庸常的骨架，却主要来自贫穷，来自习俗以至民族带来的压抑。正如他自己所慨叹的：“不但我的骨架不曾伸长些，生活在人间这么一堆日子，在心灵上，我脆弱幼

稚得也依然是个矮子。”①

他是个“遗腹子”，生来不识阿爸的面目。父亲萧秀林原是个“看门人”，是管开关东直门这座城门的，在封建社会属于“吏卒”一类，是不折不扣等而下之的人物。他淡泊、愁苦一生，忧郁而始，忧郁而终。见过他的人都说，从来没见过他脸上带过笑容，永远紧绷着一张严峻、阴沉的脸。他原打算终生不娶，到四十岁上，才经人撮合，娶了个误了婚期的柔弱女子。但夫妻恩爱并没有多久，当头一个儿子夭折，妻子怀下第二个孩子后，他就带着一腔愤恨，匆匆离开了人世，竟不知自己的骨肉是男是女，是死是活。“遗腹子”萧乾一来到人间，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凄凉的人世。失去父亲的孩子，就难免不受人奚落。姑姑骂他是“暮生的孩子”，婶婶的诅咒尤其令人刺骨寒心：“没有大人的孩子，坟头插烟卷儿，缺德带冒烟儿，官街官道，狼虎挡道。”“遗腹子”按说并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由于传统的习俗，竟使他横遭如此欺凌。萧乾说：“如果遗传学不是一个时髦的谎言”，那么他其后忧郁性格的成分，是“通身承袭了他（按：指父亲）的素质”的。②这当然不乏愤激之词。“遗腹子”的萧乾，很难说父亲对他有什么影响，但父亲地位的低下和过早地逝去却无疑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压抑。

另一个使萧乾感到自卑的，是他的民族出身。他是蒙族人，祖籍黑龙江省兴安岭。这当然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了。他祖上进关已过去了好几代，他自己身上也没有任何蒙族人的意识和特征。1956年他去内蒙采访，在锡林郭勒盟吃了一餐

①② 萧乾：《忧郁者的自白》，《栗子》集“代跋”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版。

蒙式早点，有半年光景连奶味都怕闻。他父亲去世得早，母亲又是汉族人，也没有从父母那里受到过一丁点儿蒙族传统习惯的熏陶，甚至连一句蒙古话也不会说。但既然是蒙族的后裔，蒙族的身份毕竟还是在他家里留下了痕迹。小时候总记得堂兄家供着一座祖先的牌位，平常用黄布遮起，在一块木板上画着一幅肖像，那完全是牧民的样子。还有一本家谱之类的书，上面写的统统都是蒙文。特别是年终祭祀时，上供用的是放了牛油的小米粥，那更是十足的蒙古风俗。按常理讲，出身蒙族，也没有什么倒楣的，但在旧社会这却已足以成为人们自卑的理由了。那时少数民族所谓的汉字还加“犬”字旁，现今的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旧称是“绥远”和“归化”；在学校里，他经常看到汉族同学追打着回族和蒙族的孩子，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甚至带点南方口音的同学也被叫作“豆腐片儿”或“蛮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总是感到“矮人一头”，还常常把自己的蒙族身份也隐瞒起来。

自然，使萧乾真正遭到屈辱的还不止于此。如果说习俗的和民族的压抑还不过是一种无形的压力，那么，贫穷带来的耻辱和早年寄人篱下的生活，这才是最实际、最无法抹去的压力。

父亲撒手西去以后，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苦命的寡母，寡母的一双空手。像中国大多数善良、坚毅、执著的母亲一样，萧乾的母亲饱受生活的辛酸，却表现出坚韧不拔的毅力。她出身寒门，只能嫁给一个贫穷而又决心独身的男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幸，而况男人早逝，又这样的委屈了她的一生！但她尽管历经磨难，对生活却始终没有失去信心，那种顽强地与厄运搏斗的精神，给萧乾的影响极

深。他完全是在依傍母亲中长大的，她给予他的则是与父亲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进取型的性格：

……谢谢那只大手，它为我安排下那么一位善于遣愁的母亲；纵使在我们快断了粮的日子，她也还能把我拢在怀里，低吟着《槐树黄》一类歌谣。由她，我又承袭了一片阳光，一泓暖流，对生命的一股热情。她教我愉快、乐观，好意地估量别人，对万物普遍地发生情趣。^①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要把他拉扯大，要使他有出息。但在那样的社会里，一个柔弱女子又有多大的力量。她只能靠从外面揽来针线活计，有时给人家拆洗缝补以维持生计。她手不离针线，没日没夜地做，炕上总是大堆大堆裁好的布料和棉花，但还是糊不了口。有一回真的揭不开锅了，她只好抛头露面，去给一家大户人家当佣工。从此，她又受尽了白眼和叱骂。在那嫌贫爱富的世道里，穷就“矮人一头”，有时还不止一头。由于萧乾母亲的奴隶地位，使他不仅受着物质匮乏的磨难，还受到精神上的凌辱。母亲干活的地方离家并不远，但是一个月才准回来一趟，孩子想娘，要见上一面，就得跑到“宅门”外边去守候。碰上好心的人，兴许给往里头捎个话儿，母亲抓机会溜出来，提心吊胆地亲他一下，塞给他几吊钱，就又消失在朱门里。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能像一个叫化子一样，被斥退、赶走。这种人世间不公正的命运，给一个幼小孩子留下的心灵上的创伤，该有多么深重！

在自己的“家”里，萧乾所受到的是寄人篱下的待遇。当

① 萧乾：《忧郁者的自白》。

时他和堂兄们聚族而居，维持着所谓大家庭的局面。全家共有三房。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也同样反映在这个家庭中。孤儿寡母是最好欺侮的，虽然他母亲累断筋骨拼命干活，母子二人仍然被看成是这个家庭的“寄食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别的房里过冬有火炉，唯独他家没有，冬天房里冷得像个冰窖，脸盆里是冰，水瓮里是冰，连眼睑上的泪水仿佛也凝成了冰花。他家屋里的钟，摆着的盆景，原是母亲的陪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移到了婶婶的房里。母亲是个老实人，于是就成了全家的出气包、受气筒。小萧乾不懂事，大小总惹点乱子，更成了家人随意打骂的对象。母亲外出当佣工，萧乾待在家里，那就完全形同居住在“篱下”了。母亲把他托付给比他大二十来岁的三堂兄时民“照顾”。三堂兄由于经常赋闲，到处碰壁，脾气变得十分暴躁，“管教”起来也就更不容情，动辄罚跪，或者是按在炕上用棍子抽打。有一回竟当着他母亲的面，拿把菜刀在他头上直晃，吓得母亲变了脸色。萧乾的自传体小说《矮檐》记录了他的童年时代的这一段生活，小说中母亲教育孩子的一段话：“《名贤集》里有一句是：‘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你懂不？”正是萧乾含着辛酸和泪水写成的。

童年的印象对于一个人来说“具有决定意义”^①。萧乾在“矮檐”下长大，从小受尽生活的磨难和屈辱，使他表现得异乎寻常的早熟，也为他日后倔强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回忆童少年时代的生活时，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在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中，我生长下来了。当我才接触到世界时，

①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我便学习憎恨世界，厌恶同类。我对于谁都存着戒心，在善良上，为一切人打着折扣。那时候，我有一个私藏的小册子，可惜在一个除夕，我把它焚了。在那册子上，我还署了一个‘萧恨吾’的名字，它充分地代表了那时节我厌恶一切的强烈。”^①这段话可说是形象地概括了早年生活环境在他性格形成中投下的浓重影响。后来，他不顾一切向命运挑战，同恶势力抗争，虽然“遭到过沉重的打击，如晴天霹雳”，但“还命长，居然活着看到乾坤的扭转”^②，不能不说曾得益于早年艰苦环境的磨练。从作家一面说，童年的印象对他后来创作基调、风格的形成也起了相当的作用。他的小说创作大都反映“底层”社会生活，受歧视的孩子、弃妇、洋车夫、老家人是他主要描写的对象，这正是他童年生活投下的影象。正如他在谈自己创作“出发点”所说的：“我想做的是把我早年的经历和见闻所留下的印象，用有形的文字记录下来，让读者走进我那个窄陋的小世界来分享我的喜悦与悲哀。”^③这样，以丰厚的生活为基础，无疑使他的创作增加了现实主义成分，具有较为深广的社会意义。

是的，生活是最严峻的教科书，尤其是最初映入人生的一幕，给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永远难以忘怀的。生活所给予萧乾的待遇是极不公正的，它没有为他安排下一个铺满鲜花的童年，反而使他历受劫难。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幸，但是，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在生活的“底层”磨砺而

① 萧乾：《忧郁者的自白》。

② 萧乾：《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独白》，载《当代》1982年第6期。

③ 萧乾：《一本褪色的相册》。